

从“文化—历史哲学”“早期启蒙” 到“中西比较”

——许苏民学术思想理路论析

杨肇中

摘要:许苏民是一个以从事学术研究追寻中国现代性文化根芽、觅求人类普遍性价值为志业的纯粹学者。他明确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建构其文化—历史哲学理论。他自觉继承梁启超、侯外庐、萧蓬父等前辈学者的学脉,以强烈的现实关怀,不遗余力发扬光大“早期启蒙”学术精神,力图从明清传统社会思想中寻求现代性因素,以重塑中国式现代性。许苏民深具中国情怀和世界历史眼光,其中西文化与哲学之比较研究的立意在于中国现代性价值的重建,故与其“明清启蒙”之研究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许苏民著作等身,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出了突出的学术理论贡献。

关键词:许苏民 文化—历史哲学 早期启蒙 中西比较

作者杨肇中,福州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教授(福州 350108)。

许苏民是一个以从事学术研究追寻中国现代性文化根芽、觅求人类普遍性价值为志业的纯粹学者。2024年初,许先生魂归道山。他的逝世,对学界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对许苏民的学术思想进行研讨、总结与弘扬,是对他最好的纪念。大体来讲,许苏民毕生致力三个研究领域:一是文化—历史哲学研究;二是明清早期启蒙思想研究;三是中西文化与哲学比较研究。许苏民在以上领域皆有独创特解,且著作等身,属于高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儒家仁学视域下全人类共同价值及其国际认同机制研究”(FJ2022A001)。

产学者。他从事学术研究的特色是“将文史哲三者相结合、将古今中西相会通来从事哲学研究”^{[1]553}。实际上,关于许苏民学术思想研究的特色,从他对学生的要求中可窥其一斑。他在指导博士研究生时总是不忘叮嘱:做学问要有宏大的气象,须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上走过。此外,许苏民的文章之谋篇布局与写作风格也颇具特色:问题意识强烈且聚焦,充满现代性关怀;论说气势蓬勃,纵横捭阖于古今中西之间;其为文颇类似于名满天下的梁任公,笔锋常带感情。因此,许苏民所写之论著,即使是三十多年前的作品,至今读来,仍觉得兴味盎然,极富学术思想与生命力。下面仅就许苏民学术思想理路的几个特色作一论析。

一、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彰显:文化—历史哲学之“第一原理”的建构

许苏民是著名的文化—历史哲学家、思想史家,20世纪90年代初就颇有盛名。1994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哲学思想——当代中国部分哲学家的学术自述》就有一章专门介绍许苏民的学术思想,即《“文化—历史哲学”的探索》。该文对其前二三十年的学术心路历程进行了总结:“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文化哲学和历史哲学,由于这二者具有内在的相通之处和很多的结合点,因此亦可称为‘文化—历史哲学’。……任何哲学家的思想,都有作为其理论基石的‘第一原理’。……我的哲学思想的第一原理可概括为:‘我在,故我心在矛盾中求和谐。’……‘我在’,是指作为主体的现实存在——在创造文化和历史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对象化自身和重塑自身的现实存在。”^{[1]553-554}我们从这段自述性的文字中可以看出,许苏民对其“文化—历史哲学”研究之“第一原理”的表述,宣示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立场。他从近代科学理性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切入,言说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第一原理”是与之相反的“我在,故我心在矛盾中求和谐”。这个“第一原理”的概括,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角度来论说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其中,“我在”是指“在创造文化和历史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对象化自身和重塑自身的现实存在”,而“矛盾”是指现实存在的、动态发展着的客观世界中的五个对象性关系之矛盾,即人与自然、人与作为个体存在的他人、人与社会群体、人与现存的传统文化氛围、人与所处历史。

在解决上述五对矛盾中达致的和谐状态,是人类对真善美之统一的追求的体现。而对真善美的追求方式与水平,即形成许苏民所谓之“文化”。许苏民将“文化”定义为“文化,是一个标志着人类在真善美诸方面的发展水平的哲学范畴,是人处理其与客观世界的多重对象性关系和解决人类心灵深处永恒矛盾的方式,这种方式表现为,对象化为千态万状的文化现象”^{[1]556}。在许苏民看来,文化可以统摄真(科学理性)、善(意志)、美(情感),融合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哲学思潮,是当代世界哲学的发展趋向。

因此,他力图建立文化—历史哲学体系,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扬弃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个互为对立的哲学思潮,从而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精神现象学。正如许苏民在《文化哲学·后记》中所说:“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对以往几乎被唯心主义独占的精神心理领域作出唯物史观的解释,成为我的努力方向。”^{[2]316}文化—历史哲学的研究进路,也就成了许苏民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体系的主要特色。值得一提的是,许苏民在建构文化—历史哲学体系的研究之路上,不仅自觉践行马克思主义立场,而且对学生的要求亦复如斯。他总是嘱咐学生,要多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的著作——《中国思想通史》。

许苏民立足于“文化—历史哲学”之“第一原理”,撰写了诸多名篇巨制,如《文化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历史的悲剧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比较文化研究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人文精神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等。这些著作皆为许苏民早期的文化—历史哲学研究成果,他的这些努力很快便得到了国内学界的肯定性评价。1993年,许苏民被《中国现代哲学丛书》编委会评为“中国当代50名哲学家”之一。

二、明清启蒙思潮的重构:找寻中国现代性重建的传统文化根芽

许苏民对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明清至近现代史,尤其是对明清之际的思想史研究。众所周知,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两个“之际”深引学人关注:一个是“周秦之际”,一个是“明清之际”。在这两个“之际”,思想史、观念史出现了巨大的变动,成为学人通过这些思想异动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与思想文化变迁脉动的最好观察点。如果说“周秦之际”是中国思想史上的“轴心时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的话,那么“明清之际”的思想史变迁则关涉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以及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问题,因而与当下中国的文化发展与社会变迁更为切近。由是观之,诸多学人对“明清之际”进行聚焦性研究,更富于现实关切。

许苏民的明清思想史研究极富时代特色,抑或说是现代特质。记得有一天我去先生家里拜访时,看到书桌上有一本学术著作,由于时间太久,具体书名已经记不得了,但在该书的扉页上,有先生亲笔写下的一句话:“研究现代问题要有历史感,研究历史问题要有现代感。”虽然当时没有就这句话专门请教先生,但大体可窥见其研究思想史问题的基本态度与思想偏好。众所周知,许苏民是国内明清启蒙学术思想史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具有强烈的学脉传承意识,其学脉传承为梁启超—侯外庐—萧萐父—许苏民。许苏民关于明清启蒙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两类:一是具有断代史性质的明清之际启蒙学术思潮研究,如《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与萧萐父合著,辽宁教育

出版社1995年版,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二是具有个案研究性质的学术著作,如《王夫之评传》(与萧萐父合著)、《顾炎武评传》和《李贽评传》等。这些著作在学界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奠定了许苏民在明清学术思想史研究领域里的重要地位。

明清启蒙学术思想史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其中心问题意识、主要理论旨趣,以及具体时段的研究划分等。这些问题在许苏民与萧萐父合著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一书中有着集中体现。萧萐父在跋语中透露出作者致力于发掘明清启蒙学术思想之问题意识,即“为什么明末清初这批学者在300年前写的书会对辛亥革命起到鼓动作用?这个问题,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也在不断扩展,并衍生出更多的问题。诸如何谓近代?东方各国的近代起于何时?中国有过自己的文艺复兴么?百年来中国的败辱源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的振兴能靠欧风美雨么?问题交加,无以自解,织成心中一个历史情结,长期纠缠着自己的灵魂”^{[3]606}。再加上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哲学史观与方法论的启悟:“关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方法,以及历史的发展只有到特定阶段才能进行自我批判和总结性反思。”^{[3]607}此外,还有前辈学者如梁启超、侯外庐等对晚明清初批判思潮中启蒙因素的发掘之启示。如上诸多因素的凑泊,使得作者坚定了在明清之际学术思潮中清理出启蒙思想的决心。

当然,作者致力于明清启蒙学术思潮的研究,除了与个人的境遇相关外,还受到当时国内学术研究大背景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文化问题讨论热潮中,普遍提出文化寻根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中国走出中世纪的文化历程起步于何时?明清之际文化思潮的异动是否具有启蒙性质?中国式的启蒙道路经过什么曲折?具有什么特点?留下什么教训?这一系列问题及其争论中的异说纷纭,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促使我严肃思考,参与争鸣。”^{[3]608}这些时代背景影响个人学术研究的叙述,对许苏民来说也是相似的。正如萧萐父所说:“许君苏民,英年笃学,曾耕读于樊城,复采珠于汉上,殷勤积靡,卓然有成。这时期他也多有论著,于明清学术思潮尤为着力,在一系列重要观点和评断上,我们时有唱和,嚶鸣相应,闻风相悦,颇得濠上之乐。”^{[3]608}基于上述考量,萧萐父、许苏民遂“确定本书(即《明清启蒙学术流变》)的主题,以凸显明清启蒙学术思潮及其流向、变异为宗旨,着眼于中国开始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的文化进程,确立主潮,观其流变,正面论述,彻底跳出所谓‘两军对战’‘汉宋纷争’‘朱陆异同’之类的陈旧模式”^{[3]608-609}。明清启蒙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主题确定之后,该书文稿的撰写工作全部由许苏民独立完成。^{[3]609}

在许苏民看来,中国现代化的主题有三:民主、科学与道德。由于三者 in 明清之际的学术发展历程中先后呈现,因而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史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晚明时期(16世纪30年代—17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的思想特质是抗议权威、冲破囚缚,立论尖新,但不够成熟,以李贽为代表;其次是明末清初时期(17世纪40年代—18

世纪 20 年代),该时段的思想特质是深沉反思、推陈出新,致思周全而衡虑较多,以王夫之为代表;最后是清中叶时期(18 世纪 30 年代—19 世纪 40 年代),其思想特质是执着追求、潜心开拓,身处洪流而心游未来,以戴震为代表。

许苏民认为,明清之际的社会发展是从一个传统向现代的前进运动。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晚明时代的历史主题是以个性解放思想与自然人性论为出发点的新理欲观、情理观、义利观、群己观的出现,及其对当时社会各种异化现象的揭露与批判;明末清初时期的历史主题则是初步民主思想的呈示,比如,以重新解释五伦关系为基础的各种“公天下”的政治设计,以及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第三阶段的历史主题即为近代科学精神的涌现。

以上便是许苏民关于明清启蒙学术思想史研究的通论性观点,其问题意识之明确与理论构架之严谨,令人印象深刻。在一定程度上,许苏民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研究是对梁启超、侯外庐等启蒙论说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同时,这也是哲学家研究思想史的典型进路。换言之,他们在研究思想史之前,有一个明显的现代性观念的楔入。在他们看来,民主、科学与个性解放的新道德观等构成了人类现代性观念的核心内容,这也是启蒙学者衡量明清中国传统社会是否存在启蒙思想因素的主导性哲学评判标准。实际上,按照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念,明清启蒙学术诠释模式的思想史研究进路在当代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许苏民对明清启蒙学术思想史的研究,除了以上具有通论性质的著作外,还有诸多个案性的研究成果。在南大读博期间,我经常听到先生的如下教诲:做思想史研究,必须从个案研究开始。换言之,通过诸多个案性的研究,方可把握一个时代思想的总体性特征。许苏民为何如此主张?因为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大多从历史上的著名思想家所留存之文本开始,可以说思想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思想文本诠释学。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不过,侯外庐主张从事思想史研究须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力图做到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统一与融合。譬如,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便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在一起编著的,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4]序1}。也就是说,思想史研究所关涉的范围要比主要聚焦于思想家文本之概念、范畴与逻辑等内容的哲学史研究更大、更丰富。以上启蒙学者的研究思路大体都在许苏民关于思想家的个案性思想史论著中得到体现。许苏民中年主要从事明清启蒙学术思想史研究,著述宏富,有《王夫之评传》《顾炎武评传》《李贽评传》《戴震与中国文化》等。

众所周知,作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者的王夫之,其思想既富于深度,也较为成熟,颇为后世学者所看重。《王夫之评传》是许苏民与萧萐父合作的论著,是一部具有典型性意义的个案思想史研究成果。如果说《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使得明清启蒙学术思想研

究的谱系建构趋于全面系统,那么《王夫之评传》堪为启蒙学术思想研究走向成熟之作。按照萧蓬父对成书的介绍,两书虽为合著,但许苏民在撰写过程中出力尤多,故本文以此为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以窥其如何重构王夫之启蒙思想。大体来讲,该学术建构具有以下五个特质:

第一,许苏民明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来建构王夫之的启蒙思想。他认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传统社会母体内孕育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历了萌芽、挫折和复苏的曲折过程,一方面是新的关系要突破旧的关系的束缚,另一方面,旧的社会势力又竭力阻止新生事物的发展。这种客观历史进程中的矛盾表现在思想领域则是新旧杂陈,方生未死,新观念往往借助旧范式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或以复归原典的方式来表达新的时代诉求。……这些新思想企图突破旧有的框框而建立一种带有近代人文主义特质的理想社会。”^{[5]3}《王夫之评传》对王夫之启蒙学术思想的建构与价值评判,皆是在如上基调中展开的。实际上,许苏民的明清启蒙学术研究,既承继了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说”,又有所创发。

第二,从撰写体例与叙事逻辑来看,许苏民将建构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摆在首位。他认为:“哲学是王夫之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全部学术成就中的活的灵魂。夫之的哲学理性,是要为人类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活动提供一个具有终极意义的合理性依据。在这一意义上,哲学理性是体,而各个具体领域的理论探索则是哲学理性之用。因体以发用,由用以显体,正是王夫之建构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的方法论精髓。”^{[5]87-88}不过,近年来学界关于王夫之哲学思想的研究,大多将其置于宋明以来中国传统道学的叙事范式中加以展开,并将王夫之的哲学思想视为道学范畴内的一种异动,而不是对中国传统道学的实质性逾越。以许苏民为代表的启蒙学者则认为,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有其超越宋明理学的高妙之处,其思想特质为“精研易理,反刍儒经,熔铸老庄,吸纳佛道,出入程朱陆王而在更高的思想层面上复归张载,驰骋古今,自为经纬,别开生面”^{[5]87}。可见,许苏民注重对王夫之哲学思想中所内蕴的启蒙价值与意义的理论阐释。

第三,许苏民对王夫之的史学思想亦有独特的阐发。首先,许苏民着重发掘王夫之“依人建极”思想中的人本主义意蕴,“强调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因而必须以人为出发点来考察社会历史,考察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及其活动规律”^{[5]612}。众所周知,西方的人本主义精神是对其神本主义的反动,在欧洲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中得到了大力的阐扬。王夫之“依人建极”的观点,与欧洲的人本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契合之处,也是许苏民颇为注重并大加阐发的精神思想资源。其次,许苏民认为王夫之“理势合一,理随势变,法因时而改”的观点,是基于其哲学本体论思想的一种认识论表达。这一思想是对“天不变,道亦不变”之千年成见的有力反驳,这也是王夫之的理势观之所以能在晚清时代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主要理论逻辑。

第四,许苏民对王夫之人性论思想的建构亦具启蒙特色。一般认为,王夫之的人性论是建构在其“气本”论基础之上的。性不能离开气质来讨论,否则就是论“命”,而非论“性”。王夫之在承继朱子的同时,又与之截然异趣。“性”即“理”,“理”是事物之条理与属性,王夫之主张气质中自有其“性”与“理”,而非“性”“理”附着于气质之中。由此可见,王夫之的人性论具有去理之“实体化”取向。正如许苏民所说:“王夫之一反以往中国哲学中普遍流行的那种把人性看作是永恒不变的先验属性的观点,致力于从生活与实践的观点考察人性的生成和发展,提出了‘性生日成’‘未成可成,已成可革’的‘继善成性’的人性发展理论,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对于人性进化和完善的新要求。”^{[5]312}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许苏民对王夫之人性论的建构,凸显了其颇具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明清思想启蒙论特质。

第五,许苏民从政治、经济方面论析王夫之启蒙思想的呈现。王夫之对明清之际的现实政治与社会经济制度的思考颇具洞见。许苏民认为:“王夫之以其对从周文王以来近三千年君主专制主义的批判,对专制极权可以强国论的驳斥,对专制政治的非道德性的揭露,对‘正统论’和‘道统论’作为专制统治者‘镇压人心’之具的本质之洞察,对以朱熹为代表的‘申韩之儒’的抨击,以及对‘生民之生死’高于‘一姓之兴亡’的近代政治学原理和‘行之以自然’的经济学原理的揭示等等,反映了中国的旧政治和旧经济向着近代转型的历史进步趋势。”^{[5]379}在许苏民看来,王夫之对传统君主专制的批判,集权与分权的设想,人治与法治的剖析,以及民生、土地、商品经济等问题的改革主张,皆可视为他对当时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的一种深切回应。事实上,以上对传统制度性问题的批判与反思,自晚明以降,绵延不绝。以至晚清,随着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沉痾日深,以往的历史记忆被再次唤醒。王夫之的启蒙思想得以被重视,可谓适逢其会。而许苏民的明清启蒙学术建构,亦饱含强烈的现实关切。

许苏民曾经赞赏萧萐父的“哲学启蒙”论:“萧萐父先生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的《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代表了中华民族文化自觉达到的最新水平’。……萧萐父先生是我们时代文化自觉的灵魂。”^{[6]17}其实,作为一个明清启蒙学术思想的阐释者来说,许苏民对萧萐父的积极评价也是一种夫子自道。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掀起了一股“文化热”。在这一文化热潮当中,学人对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关系的探讨,以及对自我文化身份认同与文化自觉问题的关注,令人印象深刻。许苏民很关注现代性问题。实际上,自萧萐父始,“明清启蒙学术”派就提出了一个独特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认知视角,一反以往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观点,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在传统社会中寻求具有现代性的因素,而不是笼统弃绝传统,全然效仿西方,全盘西化。明清传统社会中自带的现代性因素便是启蒙学者所说的“早期启蒙思想”,萧萐父将这一学术研究的理路形容为“寻找传统与现代的接合

点”。对于传统与现代的应然关系,许苏民认为:“人与现在的传统文化氛围的悲剧矛盾冲突及其解决方式,在历史的创造活动中突出地表现为‘人类天赋的诡辩法’与‘在传统的范围以内打破传统’。从发展的连续性来看,新传统最初总是在旧传统的母体中形成,从旧传统发展到新传统的过程,乃是由一系列‘在传统的范围以内打破传统’的互相联系的环节所构成。……理智的改革者应善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历史的结合点。”^{[1]562-563}许苏民接受萧萐父“接合点”的观点,表明他们都注重对作为启蒙思想的明清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许苏民沿着如上思路展开明清思想史研究,并提出了一个具有创新性的观点,那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内发原生”模式。许苏民认为,他的这一观点是“接着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往下讲,汲取海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思想的大量研究成果,确立中国近代化之路的‘内发原生’模式,试图将晚明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万历九年(1581年)确定为中国近代史之开端。并认为,这一突破不仅将改变中国近代史的叙事方式,而且有助于突破世界近代史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一元扩散’的西方话语模式,确立现代性因素‘多元发生’的新观念”^{[7]171}。由此可见,许苏民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已然打破以往西方一元现代性主导的思维模式,秉持多元现代性立场,并从历史的角度来发掘中国的现代性,建立中国自己的近代史话语体系,在中国传统思想宝库中开掘适合现代化的合理性因素,进而有利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7]17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的前提即是文化自觉。也就是说,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时代价值,不但要充满自信,而且要善于运用理性的头脑,从中批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做到古为今用。这就需要有一个文化自觉的意识。实际上,以许苏民为代表的国内“启蒙”学者,在二十多年前,甚至更早时间,就在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上表现出了弥足珍贵的学术理性,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作出了突出的学术理论贡献。这也是本文所说的“早期启蒙寻根芽”之用意所在。所谓“根芽”,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现代性因素。进言之,在许苏民的学术人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工作,体现了其作为一位优秀学者的时代理性精神与学术研究的前瞻性。

不过,在对明清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上,许苏民关于启蒙学术诠释的进路却在学界引起了一定程度的争议。譬如,对史料的重视与诠释问题。许苏民服膺萧萐父重视史学训练的看法,认为:“萧先生很重视学生的史学训练,十分强调‘不为迂儒,必兼读史’‘穷性命者,必究于史’,……先生对史学训练的重视,使我确立起这样一种治学态度,就是一切从史料出发,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而不是用任何先验的模式去套思想

史和哲学史。……讲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也只能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明清之际的中国,并不是每个学者都有启蒙思想,确实有才能说有,没有就不能说有,更不能作过度诠释。”^{[6]19}尽管如此,也曾有学人提出对启蒙话语诠释模式的“非历史主义”倾向的批评。实际上,作为历史哲学家的历史研究自然与作为考据学的史家研究路数是不一样的,差异主要在于历史哲学家的精神理念价值优先的色彩比较明显,而一般史家多是考据式的,其历史观念大多是隐而不彰的。许苏民的研究进路显然属于前者。正因如此,有的学人对许苏民的研究路数不够理解与认同,认为他是“六经注我”,而非考据家式的“我注六经”。实际上,无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都是从事学问研究的重要进路,两者主要是方法论的差异,并无高下之分,各自有其独特价值。不过,许苏民在20世纪80年代参与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本精神问题的讨论时,就表示过其不赞成“六经注我”的态度。许苏民说:“对这一根本精神所作的解释应该力求通过‘神交古人’以合乎历史的实际,决不能以‘六经注我’的态度,把诸如人本主义、主体精神之类的近现代用语廉价地给予古人。”^{[8]34}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确乎有“高明”与“沉潜”之别。历史哲学家多有“高明”之思,而考据家则颇有“沉潜”之功。作为一个文化—历史哲学家,许苏民之立意在于兼顾“高明”与“沉潜”。然而,学者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做到兼顾而毫无偏颇,很多时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或许借用司马迁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来形容包括许苏民在内的学人的心声,是比较合适的。

三、中西比较研究的深蕴:致力于人类共同价值的历史追寻

关于中西文化比较与哲学比较的命题,也是许苏民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之用力所在,其代表性著作有两部,即《比较文化研究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前者“将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史从16世纪写到20世纪,该书的特点是以中西哲学家注重的中西哲学和文化的平行研究来弥补史学家所注重的中西文化的影响研究之不足,将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思路相结合,试图总结中西哲学和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性”^{[9]4},后者则在此基础上,对哲学领域的本体论、认识论、政治哲学、道德伦理与宗教哲学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史的重构。可见,后者是对前者的进一步深化与扩展。我们在此需要讨论的是,许苏民致力于中西文化抑或哲学比较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与其从事的明清启蒙学术思想史研究之间有何内在的逻辑联系?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能够窥见许苏民作为一位历史哲学家的深刻关怀。

首先,许苏民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眼光”来从事中西文化与哲学的比较研

究。这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许苏民不认同学界对中学西渐过程中中国文化对欧洲影响的解释,即欧洲的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是由中国文化的影响所致,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唯物史观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石,也是我们看待中国文化给予西方影响的基本出发点”^{[10]26}。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是历史事实,但这只是外因,欧洲的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主要还是内因在起作用。欧洲走出中世纪以后,其思想观念的变异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中国文化思想只是为其提供了有力的助援。另一方面,许苏民致力于中西比较研究的理论眼光,认识到“从全人类共同繁荣与进步的观点来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是历史的必然要求”^{[9]17}。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眼光”,中西文化之比较问题便不再是“以西释中”或“以中释西”,而是要在一个人类共同的现代性基准上去评判中西之异同,深入剖析其异中之同、同中之异。许苏民对学界近年来过于关注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而忽视其作为人类普遍性的特质现象提出批评。譬如,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许苏民批评来自域外学界关于“中国有思想而无哲学”的论调,并通过近四百年来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历程中的大量史实来驳正上述错误观点。正如许苏民所说:“中外学者都认为,哲学是文化的灵魂。说中国没有哲学,意味着中国文化是没有灵魂的,这是一种严重的歧视和偏见。……四百年来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史也证明,对于绝大多数西方学者来说,中国哲学的存在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客观事实。目前国内学术界流行的所谓‘在西方特别是欧洲,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始终受到质疑’的论调是不合乎历史事实的。”^{[9]自序1-2}由此可见,许苏民致力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史之研究的问题意识在于坚定学人对人类普遍性真理探求的信念。这是一种全球化视野下学人所应具有的世界历史眼光。正因如此,许苏民几十年来一直坚持在这个研究领域里辛勤耕耘,才有晚年关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厚重成果面世,嘉惠于学林。

其次,许苏民从事中西文化与哲学比较研究的“中国情怀”。许苏民从事中西比较研究的立意初衷在于其浓厚的“中国情怀”。换言之,他通过中西比较研究来寻觅与重构作为人类普遍性真理存在的现代性价值,进而以此价值来构建中国式的现代性,并对现代性价值在中国呈现的具体模式进行深入探索。诚如许苏民所说:“400年的西学东渐,最主要的是给中国请进了‘赛先生’(Sciense,科学)、“德先生”(Democrace,民主)、“穆先生”(Moral,道德)。而这三位先生的共通的精神本质,就是尊重公理、尊重逻辑的精神。所谓‘公理’,既是科学的真理,也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因此,在科学的公理上,在人类普遍价值问题上,中国应该向世界认同。基于公理的合乎逻辑的推导,中国就应该走人类共同的发展道路,而不应游离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之外。”^{[10]824}由此可见,许苏民是基于中国情怀而致力于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同时,许苏民的“中国情怀”并非民族主义的,而是深具现代价值理性的思想展现。譬如,他在论析中西文

化交流互鉴的意义时说：“从全人类共同繁荣与进步的观点来看，不仅西方文化的自我完善有待于进一步从中国文化汲取营养，中国文化要迈上现代化的台阶也有待于从西方文化中汲取营养。……在这方面，西方学者的中国探寻和中西文化比较，为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保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借鉴。”^{[10]33}我们从中可以窥见许苏民中西文化与哲学比较研究的落脚点在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构建中国式的现代性。

最后，许苏民的中西文化与哲学比较研究与其明清启蒙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内在逻辑联系。许苏民从事学术研究的领域比较广，文化—历史哲学与明清思想史研究是其主要研究领域。而他的文化—历史哲学是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展开的，因此，中西文化与哲学比较研究与明清启蒙学术思想史研究便构成了许苏民学术研究的两大支柱。而且，二者在学理逻辑上具有密切联系，甚至可以说互为犄角。首先，致力于全人类的共同繁荣与进步是许苏民从事学术研究的基调，即追求人类普遍性真理与现代性价值；其次，许苏民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调中，对近四百年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程中所存在的“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的思想质素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进而得出中国传统文化可以通过创造性转化来实现其向未来敞开的独具特色的现代性价值；再次，许苏民对于明清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是建基于人类具有共同的民主、科学与道德的现代性价值之上的，构建“启蒙”学术话语来发掘中国在明清社会变迁中孕育出来的现代性因素，进而达致“传统与现代的接合”，重塑中国式的现代性价值结构。

总之，许苏民的中西比较研究为其提供了人类共同的现代文化价值框架，对明清思想史研究来说，则起着一种滤镜的作用。换言之，许苏民在现代的价值视野下，通过审视中国传统社会与思想的深度变迁，重估传统自身的价值，进而重塑中国之现代性。许苏民在具体研究过程中，真正做到了虽对中国传统思想中不合时宜的反现代因素予以严厉批评，但不妄自菲薄，而是善于从传统中发掘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资源。实际上，许苏民的中西比较研究，超越了西方中心论与中国文化本位论，展现了一种公允、理性的学术精神。

结 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自信日益受到重视，而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自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也日益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因为它是中国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这一理论认知的出现，除了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益崛起的大势外，也得益于学界前辈们长期的文化研究之努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理论界相继出现了“文化热”与“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

化,以及人文精神等成为学人进行聚焦性研究的对象。许苏民全身心投入并参与了这些文化问题的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许苏民的大多数论著,皆是在不同程度上对20世纪末国内所出现的这些文化现象的反思与回应,彰显了其强烈的现实关怀。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苏民就提出过“文化自觉”的观点,并且将之运用到学术研究的实践当中。可以说,许苏民的整个学术研究理路,展现了作为当代中国学人的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彰显了其强大的文化自信力。而这一文化自信力为其立足于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究中国当下和未来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综上所述,“文化”“历史”“哲学”是许苏民学术研究的关键词,而“世界眼光”“中国情怀”“现代关怀”则是其学术思想的主要特质与文化底色。许苏民先生著作等身,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出了突出的学术理论贡献。他留下了丰厚的学术思想遗产,值得后辈学人不断继承与发扬。

【参考文献】

- [1] 韩民青,夏永翔.我的哲学思想:当代中国部分哲学家的学术自述.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 [2] 许苏民.文化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3] 萧萐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4] 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5] 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6] 许苏民.萧萐父先生:我们时代文化自觉的灵魂.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1).
- [7] 许苏民.“内发原生”模式: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实为明万历九年.河北学刊,2003(2).
- [8] 许苏民.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6(5).
- [9] 许苏民.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史: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10] 许苏民.比较文化研究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

(编校:龚江兰)